

# 政企关系是否影响了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张龙鹏 蒋 为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从政企关系入手,利用 2005 年与 2012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进而就政企关系如何影响产能过剩进行解读。研究结果发现:企业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助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另外,相对于正式制度完善的地区,在正式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更强且更显著。政企关系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行为的重要手段,不恰当的政府干预将加剧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政府应当逐步降低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健全正式制度环境,制约政府权力,构建现代的服务型政府。

**关键词:** 政企关系; 政府干预; 正式制度环境; 产能利用率; 产能过剩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01(2015)06-0082-09

DOI:10.13269/j.cnki.ier.2015.06.020

##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彻底结束了短缺经济时代。但与此同时,中国许多重要行业与企业面临着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可能引发诸如市场恶性竞争、经济效益难以提高、企业倒闭或开工不足、人员下岗失业以及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有损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sup>[1]</sup>。产能过剩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为了解决中国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必须对企业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以及提升产能利用率的路径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政企关系视角对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因素进行解读,探讨新常态下化解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路径,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增长。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裁判员”的同时也扮演“运动员”,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掌握着极为重要的市场资源,容易对经济运行发生不当干预。与此相随,为了适应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中国经济中存在着紧密且独特的政企关系。企业通过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来获取自身所需要的资源。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通过寻求政企关系有利于获得政府订单、信贷支持、行政审批优待等<sup>[2-3]</sup>,可见政企关系对中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是中国企业产生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sup>[4]</sup>。在中国尚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与行政体制下,政府掌握着巨大的生产性资源并拥有强大的经济干预能力,能够通过税务、公安、环

收稿日期: 2015-03-29; 修回日期: 2015-09-26

作者简介: 张龙鹏(1988—),男,贵州毕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蒋为(1988—),男,新疆乌鲁木齐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27)

境、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职能部门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导致企业产能利用率受到影响。为了避免政府干预对企业经营活动带来扭曲,提高产能利用率,企业无不重视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政企关系成为企业关系网络中最重要的维度。基于这一观点,本文探讨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对产能过剩或产能利用率的研究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特有问题的研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波动中生产能力相对于需求过剩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是企业提高效率和调整产品结构的动力<sup>[5-6]</sup>。然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却很难解释中国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基于这一现实背景,许多研究围绕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除去经济周期因素引发的产能过剩,现有对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由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企业投资的认知偏差造成的。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以林毅夫等为代表的市场失灵学说中<sup>[1]</sup>。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产生共识,出现投资的潮涌现象,但投资设厂过程中企业对投资总量信息难以估计,导致了事后产能过剩的发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结果。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以江飞涛等为代表的体制扭曲学说中<sup>[7]</sup>。他们认为,体制扭曲背景下,严重的地方政府竞争将造成各地的重复建设,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呈现产能过剩状态。各地区对于投资的补贴性竞争是导致产能过剩最为重要的原因。不管是市场失灵说,还是体制扭曲说,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认为市场进入是导致中国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sup>[8]</sup>。

现有研究仍然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首先,现有研究从宏观层面讨论了导致中国产能过剩的机制,但并不能解释微观企业产能利用率是如何决定的;其次,现有研究忽视了影响企业市场进入背后的因素,这将掩盖影响产能过剩的一些实质性因素,而政企关系便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sup>[9]</sup>;最后,对于中国过剩产能形成原因的研究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从实证层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十分匮乏,对于微观企业产能利用率决定机制的研究也微乎其微。正是基于现有研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不足,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讨论政企关系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及其对中国产能过剩带来的影响。

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根据市场失灵学说的分析,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来自于企业预期市场条件的不确定性和行业企业数的不确定,这些均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而导致的。然而,政府对于行业内的企业总数目、供需情况、投资、信贷等总量信息具有信息优势<sup>[1]</sup>。因此,良好的政企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信息优势,对未来投资机会的判断具有更大的准确性,从而提升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降低了企业因为市场失灵带来的过剩产能的维持成本。其二,根据体制扭曲学说的观点,企业产能过剩来自于政府的不当干预。政企关系是企业主动获取的结果。作为一种润滑剂,良好的政企关系可以避免来自政府的不当干预,从而有利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因此,为了缓解自身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企业往往期望通过政企关系寻求更为稳定的经营环境,从而降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更为准确地确定生产经营的目标,从而提高自身的产能利用率。因此,本文认为良好的政企关系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过剩产能并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 (一) 数据来源

为了通过企业层面的数据构建政企关系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参考王永进和盛丹<sup>[10]</sup>、谢家智等<sup>[11]</sup>、黄玖立和李坤望<sup>[2]</sup>、蒋为<sup>[12]</sup>等的研究,将世界银行2005年与2012年所做的营商环境调查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本文重点利用200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采用2012年的数据做稳健性检验。2005年的调研对中国120个城市进行抽样调查,被调查企业共计12400家。被调查企业分布在除西藏和港澳台之外的30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涵盖所有省会城市。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各调查200家企业,其他城市调查100家企业。另外,被调查企业涉及

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中的所有二分位制造业。与世界银行此前、此后关于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相比,本轮调研涉及的空间与行业范围更大,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各地区、各行业的企业特征和经营环境特征。我们采用2012年的数据做稳健性检验,原因主要是:一方面,2012年的调研仅包括了全国12个省的25个城市的1692家企业样本,所调查样本相比2005年有较大的差距,并不能最大程度涵盖中国各地区与各行业的代表性企业;另一方面,虽然本次调查同样包含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方面的信息,但是对于政企关系方面的问卷调查并不十分准确和合理,相比2005年的调查较为逊色。因此,为了确保本文得到的结论并不因样本年份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仅采用2012年的调研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2005年调研包括两份问卷:第一份问卷调查对象为企业经理人,问题涉及企业基本信息、投资环境、与客户及供应商和政府的关系、劳动力、基础设施、国际贸易、融资、经理人信息、企业治理结构等信息;第二份问卷调查对象则为主管会计和人力资源经理,要求填写企业各项财务指标、所有权结构、雇员结构等信息。第一份问卷主要填写企业2004年的信息,第二份问卷中的大部分问题回溯至2002年,即包括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的信息。因此,本文利用2004年的企业信息进行实证研究。

## (二) 描述性分析

(1) 政企关系 政府并不是由单一主体所构成,而是通过不同职能部门完成其对微观主体的管理。本文不同于已有研究采用单一政府主体对政企关系进行刻画,而从企业与各职能部门的政企关系角度出发,对政企关系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微观机制进行研究。具体地,第一份问卷的“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部分,J6问题询问了企业与税务、公安、环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关系,同时将关系程度划分为5个等级:不良(bad)、一般(so-so)、中等(average)、良好(good)和很好(very good)。我们对样本企业与不同政府部门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见表1。由表1可知,与税务部门、公安部门、环境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保持“良好”或“很好”关系的企业的比重分别达到64.01%、56.82%、55.42%、59.37%,保持“一般”或“中等”关系的企业的比重分别是35.31%、42.41%、43.43%、39.72%。另外,有极少数企业与各政府部门的关系处于“不良”状态。这一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与政府部门并不具有良好的关系,这为我们从政企关系角度研究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现实意义奠定了基础。

(2) 企业产能利用率 由于国家统计局始终未将产能利用率纳入统计范畴之内,中国经济确切的产能利用率始终无法准确度量,而企业层面的产能利用率更难以得到有效刻画。面对这一现状,现有研究不得不采用峰值法、成本函

表1 企业与各政府部门具有不同关系的比重(%)

	不良	一般	中等	良好	很好
税务	0.68	17.50	17.81	46.06	17.95
公安	0.77	23.32	19.09	41.15	15.67
环境	1.15	22.42	21.01	40.53	14.89
劳动和社会保障	0.91	20.42	19.30	42.30	17.07

数法、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宏观与产业层面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估算<sup>[6,13-15]</sup>。对于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刻画更受到种种局限,仅有Baldwin *et al.*<sup>[16]</sup>与Wang and Gu<sup>[17]</sup>对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测算进行了尝试。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无论对于宏观、行业还是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测算始终受到具体测算方式的限制。而世界银行2005年的调查数据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第一份问卷的“企业信息”部分,A3问题询问了经理人企业2002年至2004年的产能利用率。本文根据这一信息测量不同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首次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表2按照东、中、西地区报告了2002—2004年各年各地区被调查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平均值。从时间趋势来看,全国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在2002年至2004年间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由2002年的

74.94% 上升至 2004 年的 81.37% ,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在 2002 年逐步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通缩 ,并在“入世”的带动下走入了新的增长轨道。从各地区来看 ,东部、中部和西部被调查企业分别为 6 099 家、3 900 家和 2 400 家 ,东、中和西部地区的产能利用率均在 2002 年至 2004 年间呈现逐步上升趋势 ,分别上升了 5.44%、5.83% 和 6.01%。另外 ,东部产能利用率始终高于中西部地区 ,2004 年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83.61%、81.16% 和 77.67%。很显然 ,产能利用率沿东、中、西地区呈现逐步下降的空间态势。这表明地区的营商环境对于产能利用率有着重要的影响。

(3) 政企关系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表 3 报告了 2004 年具有不同政企关系的企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统计结果表明 ,随着政企关系的趋好 ,企业产能利用率逐渐上升。进一步地 ,我们将政企关系等级划分为两个等级 ,A 等级包括不良、一般和中等 ,B 等级包括良好和很好 ,然后检验 A、B 两组的企业平均产能利用率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检验结

表 2 中国各省区各年平均产能利用率(%)

年份	2002	2003	2004
东部	78.20	81.45	83.61
中部	75.33	78.48	81.16
西部	71.66	75.15	77.67
全国	74.94	79.10	81.37

果如表 3 所示。以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关系为例 ,与税务部门的关系为 A 等级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平均值为 81.39% ,B 等级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平均值为 83.52% ,前者比后者低 2.13 个百分点 ,这种差异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 ,与税务部门具有良好政企关系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更高。进一步从企业与公安、环境、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关系的角度分别测算 ,也均证实了这一结论。

表 3 政企关系与企业平均产能利用率(%)

	不良	一般	中等	良好	很好	A 等级	B 等级	t 统计量
税务	80.61	80.44	82.37	82.99	84.89	81.39	83.52	-6.270 9***
公安	79.65	81.13	82.66	83.07	85.27	81.78	83.67	-5.656 9***
环境	79.36	81.22	82.27	83.40	84.71	81.67	83.74	-6.271 8***
劳动和社会保障	78.94	81.40	81.67	83.43	84.58	81.48	83.75	-6.825 3***

注:\*\*\* 代表 1% 的显著性水平。

###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为了通过计量模型建立起政企关系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借鉴了两方面的研究确定实证策略。一方面 ,本文借鉴了已有关于产能利用率以及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相关研究 ,构建起检验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 ,如董敏杰等<sup>[15]</sup>、刘航和孙早<sup>[18]</sup>、干春晖等<sup>[19]</sup> 均通过估测出的行业或地区产能利用率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应的检验。另一方面 ,本文借鉴了已有关于政企关系的相关研究 ,构建起政企关系对产能利用率影响检验的计量模型 ,如王永进和盛丹<sup>[10]</sup>、谢家智等<sup>[11]</sup>、黄玖立和李坤望<sup>[2]</sup> 均采用世界银行的调研数据对政企关系与企业绩效、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应的检验。具体而言 ,我们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CU_i = \alpha + \beta Relation_i + \gamma X + \delta_R + \gamma_I + \mu_i \quad (1)$$

其中 , $CU_i$  代表企业  $i$  的产能利用率;  $Relation_i$  包括企业  $i$  与税务部门的关系 ( $Relation_{t_i}$ )、与公安部门的关系 ( $Relation_{p_i}$ )、与环境部门的关系 ( $Relation_{e_i}$ )、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关系 ( $Relation_{l_i}$ )。对于政企关系的度量 ,本文采用第二部分的方法 ,将企业与各政府部门的关系划分为 5 个等级:不良、一般、中等、良好和很好;  $\delta_R$  和  $\gamma_I$  分别为企业所在城市和所属行业的固定效应 ,控制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mu_i$  为随机误差项。

为避免遗漏重要解释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借鉴相关研究 ,本文加入了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其他控制变量。方程 (1) 中的控制变量集 ( $X$ ) 包括: 经理人任命方式、企业生产率水平、企业规模、企业出口、企业所有制、经理人任期以及市场化程度。控制变量具体设定如下: 经理人任命方式 ( $GM\_appointed$ ) 为一个虚拟变量 ,若经理人由政府任命则取 1 ,否则取 0; 企业生产率水平 ( $TFP$ ) 的测

量参考了 Levinsohn and Petrin<sup>[20]</sup>的方法;企业规模(*Size*) 定义为企业固定资产净额的自然对数形式;企业出口(*Export*) 为一个虚拟变量,1 表示出口,0 则表示非出口;企业所有制(*Ownership*) 是一个虚拟变量,若企业为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则取 1,否则取 0;经理人任期(*GM\_tenure*) 定义为经理人在职时间的自然对数形式;市场化程度(*Market*) 利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来度量,数据来源于樊纲等的研究成果<sup>[21]</sup>。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我们将采用 2005 年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根据计量模型(1) 对本文的研究命题进行估计与检验。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即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取值范围在 0 到 1 之间。对于这类受限因变量,如果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将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因此,我们利用归并回归(tobit) 对样本进行估计。进一步,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取值范围在 0 到 1 之间,我们实际使用的是双边归并回归。同时,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进行 tobit 回归时,使用稳健性标准误。根据公式(1),我们分别估计四个政企关系变量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由于市场化程度变量仅随企业所在地而变化,其与地区固定效应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第(1) 列至第(4) 列的回归未加入市场化程度变量,第(5) 列至第(8) 列的回归加入市场化程度变量,但未控制地区固定效应。

表 4 政企关系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基本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8)
<i>Relation_t</i>	0.009 4*** (4.87)				0.010 9*** (5.74)			
<i>Relation_p</i>		0.007 8*** (4.12)				0.009 0*** (4.82)		
<i>Relation_e</i>			0.007 5*** (3.90)				0.008 5*** (4.50)	
<i>Relation_ls</i>				0.008 0*** (4.23)				0.008 6*** (-4.59)
<i>GM_appointed</i>	-0.014 6** (-2.15)	-0.013 6** (-1.97)	-0.014 6** (-2.12)	-0.015 9** (-2.32)	-0.016 5** (-2.41)	-0.015 5** (-2.22)	-0.016 4** (-2.37)	-0.017 5** (-2.55)
<i>TFP</i>	0.026 9*** (13.51)	0.026 6*** (13.14)	0.026 6*** (13.18)	0.026 6*** (13.30)	0.026 7*** (13.25)	0.026 3*** (12.81)	0.026 3*** (12.87)	0.026 4*** (13.00)
<i>Size</i>	0.010 1*** (10.65)	0.010 3*** (10.58)	0.010 4*** (10.72)	0.009 9*** (10.27)	0.011 1*** (12.08)	0.011 1*** (11.80)	0.011 2*** (11.95)	0.010 8*** (11.59)
<i>Export</i>	0.024 4*** (5.66)	0.025 4*** (5.77)	0.025 1*** (5.75)	0.024 8*** (5.71)	0.023 8*** (5.57)	0.025 0*** (5.73)	0.024 6*** (5.68)	0.024 5*** (5.69)
<i>Ownership</i>	-0.021 0*** (-3.40)	-0.024 2*** (-3.85)	-0.021 1*** (-3.38)	-0.021 3*** (-3.43)	-0.026 1*** (-4.24)	-0.029 3*** (-4.69)	-0.026 1*** (-4.19)	-0.026 1*** (-4.24)
<i>GM_tenure</i>	0.012 2*** (4.87)	0.011 5*** (4.52)	0.012 0*** (4.74)	0.012 2*** (4.83)	0.014 9*** (5.97)	0.014 0*** (5.52)	0.014 6*** (5.78)	0.014 7*** (5.88)
<i>Market</i>					0.007 3*** (5.90)	0.006 1*** (4.82)	0.006 6*** (5.23)	0.007 0*** (5.62)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否	否	否	否
伪拟合优度	1.699 4	2.014 6	1.910 8	1.837 3	1.263 2	1.502 8	1.410 0	1.359 0
样本量	12 070	11 511	11 699	11 848	12 070	11 511	11 699	11 848

注: \*、\*\*、\*\*\* 分别代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估计系数为考虑稳健标准差后的 t 统计量;以下各表同此注。

表 4 对模型(1) 的估计结果进行了报告,表 4 的左四列和右四列各表示是否加入了市场化程度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第(1) 到第(4) 列分别表示以企业与税务、公安、环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之间的政企关系代理变量进行回归所得到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表明:无论采用何种政企关系的代理

变量,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即表明政企关系的趋好有利于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当企业与税务、公安、环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关系增加1个单位时,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将分别提升0.94%、0.78%、0.75%、0.80%。进一步地,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则很可能制约该地区的政府行政力量,从而会影响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为了避免误判,我们在回归中加入了该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变量。表4第(5)列至第(8)列的结果表明,在加入该变量之后,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效应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估计系数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

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与税务、公安、环境、劳动和社会保障等任何部门之间政企关系的加深均有助于该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从现实看,政府的职能部门,尤其是政府的税务、公安、环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均是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的重要部门。企业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政府对其的不恰当干预,会主动与政府职能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良好的政企关系避免了企业因为政府干预导致的生产不确定性,从而有助于企业做出准确的产能决策,提高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政企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为企业稳定的生产经营提供了保护伞。另外,企业与政府职能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信息优势。单一的企业对于市场总体的信息获得总是不充分的,企业往往能够通过与企业接触获得更为充分的市场信息,从而有助于企业提高产能利用率。而且,政府职能部门同样具有公共支出与公共订单的功能,企业通过与政府职能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助于其获取稳定的政府订单,从而提升了其产能利用率。

## (二) 扩展回归结果与分析

虽然一国内部具有相同的体制背景,但国内各地区也可能因产权保护、市场监管、税赋征收、法律实施、金融市场、腐败治理等方面的差异,形成营商的制度和政策“软环境”的差异<sup>[22]</sup>。企业建立政企关系是对市场、政府和法律等正式制度环境不完善的积极反应,政企关系能形成对正式制度环境的有效替代<sup>[23]</sup>,那么在不同的正式制度环境下,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有何差异?由于正式制度环境包含的维度较多,对其准确度量较为困难。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拥有更为良好的正式制度环境。因此,本文将样本按照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企业与税务、公安、环境三部门之间关系变量的估计系数更大,说明在正式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政企关系对正式制度环境的替代效应更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正式制度更为完善的东部地区,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边际影响被大大削弱了。总体上看,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在地区间的差异性证实了正式制度在一个地区的重要作用,这为我国进一步的经济与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启示。

东部地区政企关系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显著小于中西部地区,这不仅仅是由于东部地区政府的不恰当干预受到了更强的制约,同样也是由于东部地区已经构建的正式制度逐步代替了政企关系等非正式制度的结果。本文的实证结论并不是强调通过政企关系来缓解中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而是把焦点集中于为什么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表5的结果恰好说明了这一问题,即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不恰当干预造成的,而企业为了缓解这种不恰当干预所带来的损失与不利影响,往往通过改善政企关系来实现。此外,表5表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西部地区政府的不恰当干预更为严重,这也导致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更加依赖政企关系进行生产经营。

## (三) 稳健性检验

### (1) 内生性问题

内生性问题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内生性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政企关系与企业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解决双向因果关系引致的内生性问题最常用的方法是寻找与政企关系

变量相关,但不受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工具变量,然后通过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得到更为一致的估计结果。我们参照 Fisman and Svensson<sup>[24]</sup>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方式,将企业所属省区的政企关系变量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因为一个地区的特征变量并不直接受到某一个企业行为的影响,却直接与解释变量相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回归方程进行进一步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回归结果显示,企业与税务、公安、环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关系的代理变量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政企关系显著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表 5 政企关系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扩展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1)	(2)	(3)	(4)	(5)	(6)	(7)	(8)
<i>Relation_t</i>	0.007 9*** (3.00)				0.009 6*** (3.30)			
<i>Relation_p</i>		0.005 8** (2.19)				0.008 8*** (3.10)		
<i>Relation_e</i>			0.006 4** (2.46)				0.007 3** (2.52)	
<i>Relation_ls</i>				0.008 6*** (3.32)				0.006 9** (2.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伪拟合优度	-2.290 2	-1.984 3	-1.966 7	-2.011 2	0.935 9	1.008 9	1.007 1	0.955 6
样本量	5 943	5 655	5 747	5 885	5 644	5 410	5 493	5 519

表 6 内生性及非国有企业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内生性问题				非国有企业			
	(1)	(2)	(3)	(4)	(5)	(6)	(7)	(8)
<i>Relation_t</i>	0.055 9*** (5.88)				0.008 9*** (4.35)			
<i>Relation_p</i>		0.043 4*** (4.65)				0.007 7*** (3.80)		
<i>Relation_e</i>			0.031 5*** (3.58)				0.008 2*** (3.99)	
<i>Relation_ls</i>				0.028 4*** (2.74)				0.008 2*** (4.08)
控制变量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识别检验	363.533***	331.296***	373.989***	264.497***				
弱识别检验	380.713***	347.700***	387.335***	274.267***				
伪拟合优度					10.777 4	69.588 4	20.210 3	15.664 3
样本量	12 070	11 511	11 699	11 848	10 150	9 685	9 840	9 969

## (2) 非国有企业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考察的是企业与政府各职能部门间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的样本包括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虽然国有企业与各职能部门并不具有明确的隶属关系,但国有企业天生的所有制属性决定了其政企关系不同于非国有企业。正是由于这一潜在因素,国有企业样本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将导致本文研究推断的偏差。为了避免这一问题,一方面,我们在回归中加入了国有企业虚拟变量;另一方面,将国有企业样本从回归中剔除,得到表 6 所示的估计结果。因此,本文的估计结果并不受到国有企业样本的影响,得到的结果是稳健的。

## (3) 2012 年企业调研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由于可得数据的限制以及 2005 年世界银行调查数据在各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本文在基础回归中选用其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然而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新常态中,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大量制造业企业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以 2005 年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结果在新常态下是否依然成立?为了检验新常态下的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带来的影响,我们采用 2012 年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对本文的实证命题进行再检验(限于篇幅未报告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本文的实证结论在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依然成立,这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重要启示。

## 五、结论

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就政企关系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一方面,政企关系能够提高企业对市场信息判断的准确性,避免受到政府对其决策的干扰;另一方面,政企关系也能够规避来自政府的不当干预。正是由于政企关系能够降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建立良好政企关系的企业将维持更高的产能利用率,从而降低企业因过剩产能带来的维持成本。基于这一观点,本文利用 2005 年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中对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就政企关系对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一方面,企业与税务、公安、环境、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够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受到政企关系的影响更大,即在正式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政企关系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正式制度体系不完善的地区,建立在信任和关系基础上的非正式制度支持了企业的发展,政企关系是正式制度环境的有效替代。

政企关系能够提升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这说明非正式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过剩产能的降低。但从长期看,这种非正式制度同样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这不仅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与政府的寻租行为,同样导致了经济资源的误配置。因此,在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必须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行政体制,逐步建立起更加完善健全的正式制度。为此,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政府应逐步建立信息发布服务制度,发挥政府的总量信息优势,推动信息公开化、透明化,以促进企业理性投资,推动市场调节机制的顺利实现。同时,建立识别、评估产能过剩的管理体系。第二,减少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干预。在中国当前财政分权体系和官员晋升体系的框架下,地方政府作为准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容易对企业造成不当干预。因此政府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自身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发挥好“掌舵者”的作用。这就要求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

## 参考文献:

- [1]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J].经济研究,2010(10):4-19.
- [2]黄玖立,李坤望.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J].经济研究,2013(6):71-84.
- [3]潘越,王宇光,戴亦一.税收征管、政企关系与上市公司债务融资[J].中国工业经济,2013(8):109-121.
- [4]王文甫,明娟,岳超云.企业规模、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J].管理世界,2014(10):17-36.
- [5]卢现祥.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制度经济学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8):37-43.
- [6]韩国高,高铁梅,王立国,等.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波动及成因研究[J].经济研究,2011(12):18-31.
- [7]江飞涛,耿强,吕大国,等.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2(6):44-56.
- [8]李静,杨海生.产能过剩的微观形成机制及其治理[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92-200.
- [9]罗党论,刘晓龙.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5):97-106.
- [10]王永进,盛丹.地方官员任期、企业资源获取与产能过剩[J].经济学(季刊),2012(4):1193-1218.

- [11] 谢家智, 刘思亚, 李后建. 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J]. 财经研究, 2014(8): 81-93.
- [12] 蒋为.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 ——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 2015(2): 76-87.
- [13] 何蕾. 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测度研究——基于面板协整的方法[J]. 产业经济研究, 2015(2): 90-99.
- [14] 王辉, 张月友. 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产能过剩吗? ——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J]. 产业经济研究, 2015(1): 61-70.
- [15] 董敏杰, 梁泳梅, 张其仔. 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 行业比较、地区差距及影响因素[J]. 经济研究, 2015(1): 84-98.
- [16] Baldwin, J. R., Gu, W., Yan, B. 2013, "Export Growth,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Canadian Manufacturing Plant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9(4): 665-688.
- [17] Wang, W., Gu, W., 2013,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Statistics Canada, Analytical Studies Branch.
- [18] 刘航, 孙早. 城镇化动因扭曲与制造业产能过剩——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11): 5-17.
- [19] 干春晖, 邵俊, 王健. 地方官员任期、企业资源获取与产能过剩[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3): 44-56.
- [20] Levinsohn, J., Petrin, A. 2003,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0(2): 317-341.
- [21] 樊纲, 王小鲁, 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 2011(9): 4-16.
- [22] 魏下海, 董志强, 刘愿.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3(5): 35-46.
- [23] 于文超, 何勤英. 投资者保护、政治联系与资本配置效率[J]. 金融研究, 2013(5): 152-166.
- [24] Fisman, R., Svensson, J. 2007, "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3(1): 63-75.

(责任编辑: 雨 珊)

## Do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Affect Capacity Utiliz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ZHANG Longpeng, JIANG Wei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Reducing overcapacity of economy is the critical path for achiev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ased on the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 of World Bank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in 2005 and 2012, the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on capacity uti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study supports that excellent relationships among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upgrade capacity utilization of enterprises. What's more, the impact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on capacity utilization of enterprise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ose regions whose form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imperfec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are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microeconomic behavior. Inappropriat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ill increase overcapacity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government should gradually reduc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 on enterprises capacity utilization, strengthen the formal institutional system to restrict government power, build modern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Key word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orm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apacity utilization; overcapacity